

中外监督体系 比较研究

刘剑华 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监督体系比较研究/刘剑华著.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5

ISBN 7—80107—994—9

I. 中… II. 刘… III. 监督—政治制度—对比研究—中国、外国

IV. D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828 号

中外监督体系比较研究

刘剑华 著

责任编辑：王相国 向晓静

责任校对：张 蓉

出版发行：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813)

发行部：(010) 66560933 门市部：(010) 63094573

编辑部：(010) 63099728 出版部：(010) 66510958

网址：www.FZPress.com.cn

责编 E-mail：xiangxiaojing@FZPress.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山西省财税印刷厂

开 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16.75

字 数：414 千字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偷权必究)

ISBN 7—80107—994—9

定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退换)

序

腐败自古有之。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权力监督的失效使权力产生的异化与变质。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人类历史上由于腐败泛滥导致亡党亡国的事例屡见不鲜。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苏东剧变，其深层次的原因引发了我们对强化权力监督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纵观我党 80 多年的发展历程，总的看我党长期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靠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比较重视监督工作，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对权力的监督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当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监督体系和机制尚不健全、不完善，各个监督主体之间尚未形成监督合力，发挥整体效能。发生在一些部门和领域的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滋生腐败的条件与土壤还未彻底根除。特别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几乎都存在着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秩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最近，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实践证明，权力监督问题能否很好解决，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因此，抓住权力监督，就抓住了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2 中外监督体系比较研究⑨

程的重要环节，就抓住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权力监督，就是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防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在构建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上下工夫。要综合运用多种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同时，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理论研究，不断探索加强权力监督的新思路、新方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对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才能总结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才能了解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督体系中对我国监督体系可资借鉴的因素，从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

本书作者正是从中外监督体系比较研究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书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和外国的监督体系分别进行了纵向的考察和横向的比较，在系统总结中外监督体系特征的基础上，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和建议，对我们取长补短，加强对权力监督体系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山西省纪委书记

令狐炜

2005年5月10日

前　　言

腐败和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重大政治课题。为了根除腐败，监督权力，人类从古至今进行了长期不懈地探索和追求。我国自夏商开始，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上下几千年权力腐败与权力监督的斗争绵延不绝。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无处不有，无处不在。腐败如同寄生在人类肌体上的巨大毒瘤，无时无刻不在危及和吞噬着国家政权及政党的生命。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

从这一现实需要出发，本书试图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监督体系和监督理论的研究和分析，通过对中西方监督体系各个监督系统进行初步的比较和研究，探索权力监督的一般规律，从而对我国现行监督系统乃至整个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监督体系的构想。监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其监督制度的性质也不同，但它们都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成果和创新。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由此决定了中外政治制度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构成了中外监督制度相互比较的现实基础。为了便于理解和研究，书中“中外”的“外”特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包括

2 中外监督体系比较研究♀

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因为这类国家经历了较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教训，更具有典型性、可比性和差异性，“比较”的结果会更加明显。本书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十二章：第一部分（一至三章）为概论，阐述权力监督的一般理论和发展规律，对中外监督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及其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十章）为分论，分别对中外政党监督、代议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察、检察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等七个监督系统的职能与特点进行具体分析，在比较的基础上找出我国监督系统的差距，提出完善措施；第三部分（第十一至第十二章）为总论，从总体上、宏观上、动态中对中外监督体系进行剖析和对比，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体系的总体设想。

中外监督体系比较研究是个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的大课题，其内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对它研究的长期性和艰难性，加之本人的学识水平所限，写好这本书谈何容易。从广度来说，由于篇幅所限，本应属于研究范围内的东西没有提及，或虽有论及，而未予展开。如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在监督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苏东剧变带来的一系列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等；从深度来说，有些问题还论述的不够深入和透彻。如何从更宏观的角度、从中外权力结构的配置上进行比较和分析；如何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构建真正行之有效的选人用人及监督机制；如何在完善而配套的制度体系的前提下，构建监督制度运行的“动力源”等等，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大课题。本书的研究只是初步的，倘若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作者也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目 录

第一章 权力监督的基本理论	(1)
第一节 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及特征	(2)
第二节 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及特征	(22)
第三节 中外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及运行 规律比较	(32)
第二章 中外权力监督理论比较	(42)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制约学说	(4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63)
第三章 中外监督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比较	(93)
第一节 西方国家监督体系的历史演进	(93)
第二节 中国监督体系的历史沿革	(114)
第三节 中外监督理论与实践比较	(132)
第四章 中外政党监督比较	(141)
第一节 中外国家政党之间的监督比较	(142)
第二节 中外政党党内监督比较	(157)
第三节 西方国家政党监督的启示	(176)
第五章 中外代议监督比较	(191)
第一节 西方国家议会监督	(191)
第二节 我国的人大监督	(203)
第三节 中外议会监督比较	(218)

2 中外监督体系比较研究

第四节	关于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的思考	(223)
第六章	中外司法监督比较	(231)
第一节	中外违宪审查比较	(231)
第二节	中外行政诉讼比较	(253)
第三节	中外行政复议与行政裁判比较	(271)
第七章	中外行政监察比较	(283)
第一节	行政监察概述	(283)
第二节	西方国家行政监察	(286)
第三节	我国行政监察	(295)
第四节	中外行政监察比较	(303)
第八章	中外检察监督比较	(320)
第一节	西方国家检察制度	(320)
第二节	我国检察制度	(336)
第三节	完善我国检察制度	(347)
第九章	中外审计监督比较	(360)
第一节	西方国家政府审计制度	(362)
第二节	我国国家审计监督	(376)
第三节	对我国审计监督的几点思考	(384)
第十章	中外社会监督比较	(390)
第一节	中外舆论监督比较	(392)
第二节	中外社会团体的监督比较	(406)
第三节	中外公民监督比较	(421)
第四节	中外社会监督比较	(428)
第十一章	中外监督体系比较	(435)
第一节	西方发达国家监督体系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435)
第二节	对西方发达国家监督体系的评价	(442)
第三节	我国监督体系的特点	(451)
第十二章	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	(466)

目 录 3

第一节 我国监督体系改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467)
第二节 完善我国监督体系的构想	(477)
第三节 权力运行中的监控机制	(496)
参考文献	(518)
后记	(526)

第一章 权力监督的基本理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异化和滥用，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重要保证。因此，科学认识权力的特性及其运行规律，从理论上研究当前权力腐败的动向、特点和规律，不断探索权力监督及其制约机制的新思路、新方法，为科学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提供理性的思考和有益的借鉴，正是本书写作目的之所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监督与权力相伴而生，他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成为国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权力就无从谈起监督和理解监督，凡是有关“监督”的话题必然与“权力”相联系。因为“监督的对象”就是“权力”，而监督的实质就是对权力的监控。研究监督必须研究权力，因此对权力的理解便成为我们研究监督的切入点。

第一节 权力、政治权力、 国家权力及特征

一、权力的概念及特征

以权力为出发点来研究监督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权力”的概念是由“权”演变而来的。“权”被引申为两种基本含义：一是衡量选择之意；二是制约别人的能力。如孟子曰：“权，然后知轻重。”^① 早期法家慎到在其所著的《威德》中说：故贤人而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把权力、权威或规则当作区分公民素质的一种标准，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未说明什么是权力。后来的大多数政治理论家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理解权力、权威和统治之类的术语，而无需对它们作复杂的解释。甚至标志着从古典理论到现代经济理论转折点的马基雅弗利，也没有把权力当成专门的政治术语，他在论述权力关系时，通常把一个特殊事件作为一般原则，同时以专横、强力、专制等不确定术语来修饰他的原则。在马氏那里，权力主要是指统治者个人的权势。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家给“权力”一词下了许多定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众说纷纭。对当代西方政治学家的权力观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韦伯。韦伯认为政治或国家的核心就是权力，他说：“总之，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即意味着争取分配权力并争取对权力的分配施加影响，这种权力分配或者是在国家之间进行，或者是在一个国家中的集团之间进行”。韦伯以权力来定义国家：“如果行政官员在一个特定领土内持续贯彻其命令中，成功地支持了独掌合法使用权力的权力，那么这个带有连续组织的强制性政治

^① 《论语·尧曰》，见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32页。

社团就是国家。”而韦伯的权力概念则是指“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排除抗拒其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权力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①

现代政治学关于权力的形形色色的说法，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韦伯的影响。那么权力到底是什么？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基本观点：

一是“能力说”。即认为“权力”是指一个行为者（个人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个人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多数思想家持此观点。如托马斯·戴伊说：“权力是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在决定时所具有的能力或潜能。而这种决定却能影响这种社会制度中的其他一些人。”^②

二是“关系说”。认为权力是行动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行动者可能是个人、团体、民族、政府或国家。在这种关系中，其中一些行动者可以指挥、控制或影响其他行动者。这种说法甚为流行，其实质是把权力等同于政治，或者说以权力来界定政治。应该说，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但权力不等于政治。

三是“控制说”。权力有主宰、治理、管理、支配、左右、控制、影响、权威等含义。那么在政治上，权力是影响国家的行为，是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活动来控制他人。我们知道，控制只是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再者，控制过程必定有控制者与被控制者，因而，控制说是关系说的另一种阐释。

此外，关于权力的解释还有意志说、领导说、结果说等等。以上三种观点虽着眼点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权力”的共同特性：权力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局面或结果，使他人的行为符合自己的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① 转引自杨宪斌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② [美]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4 中外监督体系比较研究 ♀

权力的本质。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给权力下这样一个定义：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存在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权力是权力主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制约或支配他人行为的能力。权力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体现的是权力拥有者和权力客体两个意志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权力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权力主体、权力客体、权力目的、权力作用方式、权力效果。

权力主体是占有或行使权力的个人、团体或机构。权力主体主要指国家，此外还包括政党、政治社团及政治个人。在现代社会，占有权力的主体可能并不行使权力，这主要是由于代表制的形成使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分离开来。

权力客体是指接受权力作用的群体或个人。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关系是相对的。个人或团体在某个范围或行动中表现得强有力，而在另一个范围或行动中就可能相对软弱。在现实政治关系中，无论是在国内政治中还是在国际政治中，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即使在同一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位置也可能会互换。

权力目的是权力主体通过行使权力所要达到的目标，主要是利益或价值。利益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权力目的是权力运行的内在动力。目的一旦明确，这种利益就会刺激权力主体的意志和行为，使权力主体去控制或影响权力客体。由于权力客体不是静止的、被动的，因此权力主体的利益实现是政治斗争和政治较量的结果，这种结果即为政治格局。

权力作用的方式是权力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采取的制约、支配权力客体的方法和机制。它是权力主体有效地制约、支配权力客体、收到理想效果的有力保证。权力作用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强制方式，主要是以暴力为基础，这种方式在权力实施过程中，往往可以达到明显而快速的效果，但付出的代价也大；二是报偿方式，通过给予权力客体物质或精神利益换取其对权力主体的服从。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互惠性质的交换关系，但往往由于权力主体掌握资源的有限

性，从而导致了这种报偿方式效用的有限性。三是信仰方式，通过说服教育，使权力客体形成一种信仰，从而使权力客体心甘情愿地服从。这种方式的基本前提是权力主体具备一定的人格力量，或能运用宣传教育、文化倡导等手段，为权力客体提供一种政治理念、信仰体系，为现存的权力关系提供一种合理的正当的根据，使之认同现存的权力关系，自愿服从，从而保证权力关系的稳固。

权力的效果是权力目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政治生活中，权力的实现一般表现为客体的行为符合或基本符合主体意志的要求。

在同一社会中，权力的向心作用大于离心作用，权力主体便相互合作与协调，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也倾向于依附和顺从。相反，在离心作用大于向心作用的政治社会中，权力主体相互对抗，则会使权力主体的力量严重内耗，从而导致无法控制或有效控制权力客体。

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服从关系，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使权力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并呈现出特殊的价值和作用，同时也为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提供了依据。为什么社会需要权力，文明选择了权力？为什么历代英豪拼命争夺权力，为什么平民百姓崇拜权力，又惧怕权力？为什么古今中外无数志士仁人反复疾呼要遏制权力，约束权力？这一切都可以从权力的特性中得到说明。

权力的基本特征主要有：

1. 强制性。权力本质上是特定力量的制约关系。权力是一种强制性力量。获得权力就等于获得了使他人意志服从于自己利益和目标的能力。在权力关系中，权力主体对权力的行使无须事先征得权力客体的同意。恩格斯认为，在权力关系中，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

2. 目的性。权力的行使总是和一定的目的相联系的，这种目的构成了权力运行的内在动力，使权力主体的意志不断转化为支配行为而作用于权力客体，以实现或维持特定的利益或达到特定的目标，而不管权力客体是否需要或愿意。所以，任何现实的权力都是为一定的

6 中外监督体系比较研究 ♀

利益和目的服务的，没有主观目的的权力是不存在的。
3. 工具性。与权力的目的性和强制性相联系，权力就成为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方式和工具。也就是说，权力本身并非权力主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只是达到目的所需要的一种工具或手段。
4. 整合性。权力的整合性是由权力的能动性所决定的。因为权力是权力主体能量的高度积聚，具有巨大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一方面表现在它是权力主体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杠杆，能够使利益得到最大限度地实现。另一方面体现在它是一种积极的支配力量，能够对其他成员和力量施以强大的影响和作用。同时，权力实质上是一种价值控制和资源控制，权力主体依靠其能动性通过控制能够给权力客体带来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因此，权力能够使分散的社会力量一体化，使社会秩序维持在权力意志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一定社会、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公共权力，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价值物的分配以及对社会集团和个人的行为施加管制等，有效地影响人们的利益。

5. 不平等性。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是一种支配或控制他人的物质力量。在权力关系中，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力主体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主动的、支配的地位，而权力客体则处于被动的、被支配的地位。它反映了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单向支配及控制关系。

除上述诸种特性外，权力还具有一定的扩张性、排他性、诱惑性和腐蚀性。
扩张性，即由权力的强制性所决定，掌权者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往往会无限制地扩张权力，竭力地聚敛权力。这种扩张和聚敛就是权力扩张性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没有倡导和维护个人专断的制度，但权力潜在的扩张性往往会自发地滋生出个人专断。

排他性，即权力的无限扩张必然要打破既定的范围和界限，侵犯其他权力，甚至危及公民权利。因此，权力的扩张性和排他性是相伴而生的。由权力的扩张性所决定，权力一旦失去了有效制约，阶级的

代表者就有可能转化为阶级的特权者，社会的公仆就有可能转化为社会的主人，人民的权力就有可能转化为压迫人民的工具。如果说扩张性是权力在空间结构上的表现，那么排他性则是权力在时间结构上的表现，扩张的结果必然导致排他，排他的过程也正是扩张的过程。权力承继中的终身制、世袭制是权力排他性的典型表征。

诱惑性：权力虽然同整个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联系，但它毕竟是由社会中少数人所直接掌握，因而又同掌权者的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相联系。权力的运行过程也是社会价值和资源的分配过程，这就为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因而对于掌权者来说，权力必然具有强烈的诱惑性。

腐蚀性：由于权力能给掌权者带来普通人所难以享受的地位、荣誉和利益，因而对掌权者具有本能的自发的腐蚀作用，使其以为有权就可以享有特殊利益，权力越大享有特殊利益越多，以致驱使人们竭力地角逐利益，拼命地争夺权力，使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等腐败行为粉墨登场、兴风作浪，权力的腐蚀性便会油然而生。古今中外官场上纷纷落马的官员无不是因权力的腐蚀所致。

总之，权力的特性决定了权力的价值，而权力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是权力主体实现其利益、满足其需要的工具。因此从古至今人们对权力的追逐从未停止过，正如霍布斯所说的：“全体人类存在着一个基本倾向，即对权力的无休无止的渴望，只有死亡才能使其中止。”^①

二、政治权力与国家权力

政治权力是权力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是一切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是人类对社会进行权威性治理的权力。政治权力在西方同样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他们或是从权力主体的角度来界定，认为政治权力是指政府或国家具有的权力；或是从权力的形式来界定，认为政治权力是凭借合法的强制力（暴力）实施的权力；或是从权力的作用来

^① 转引自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98页。

界定，认为政治权力是不依附于其他任何权力的最高权威，是最终的决定权。^① 莫里斯·迪韦尔热认为：政治权力是“不依附于其他任何权力的最高权威，是最终的决定权”。^② 诸如此类，不一而论。定义的繁多，反映了当代西方对于政治权力理论研究的热衷，也衬托和显示了政治权力在政治学研究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对理论的要求和呼唤。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社会大变革，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国家机构的加强，特别是行政机构及其权力的扩张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政治权力日益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时候，地位不断变化的各种国家机构之间、国家机构和政党及其集团之间产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资本主义又面临着社会基本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表面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组织协调垄断资产阶级的各种统治机构，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维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对资产阶级政治学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在实用主义哲学指导下，便把重点转向政治权力特别是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研究，从而产生了种种关于政治理论的理论，使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呈现出多学派、多体系的纷繁多彩的景象。

但是，资产阶级关于政治权力理论的研究虽然体系繁杂、学派纷呈，却都没有能真正揭示其本质。在关于政治权力的研究中，唯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彻底打破了西方的传统，用唯物史观分析一切社会现象，论证了社会生产方式对政治的制约性，揭示了政治现象的阶级性，指出政治权力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权力。首先，政治权力是以一定财产状况为基础的。在中世纪，“特权都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表现出来”，^③ 而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政治权力的实质是阶级统治；其次，政治权力是专属国家的权力，统治阶级只有运用国家机器才能实现阶级统治。马克思指出：

^①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第117—1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1页。